

川东北考古

与巴文化研究

CHUANDONGBEI KAOGU
YU BA WENHUA YANJIU

邓幸辛 著



四川省达州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四川省达州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重点课题

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马幸辛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 马幸辛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643-0901-5

I. ①川… II. ①马… III. ①巴蜀文化—考古—研究
IV. ①K872.7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605 号

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马幸辛 著

责任 编辑	臧玉兰
特 邀 编 辑	韩琴英
封 面 设 计	墨创文化
出 版 发 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 行 部 电 话	028-87600564 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 品 尺 寸	146 mm×208 mm
印 张	4.625
插 页	2
字 数	10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0901-5
定 价	20.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关于川东北考古发现的 “巴文化”的讨论（代序）

林 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最近，达州市文物管理所所长马幸辛先生在他出版《川东北考古》（2004年）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研究，结集而成《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在付印前又诚征序于余，实不敢当。翻阅马先生书稿后，更加觉得我在前书中称马幸辛先生为“川东北考古的垦拓者”决非溢美之辞，马先生确是当之无愧的。在当今一片功利繁嚣的环境中，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在这块川东北大地上耕耘，安于坐冷板凳，挑灯夜读，论著迭出，令人钦佩。我执教多年，一直主张学术研究必须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这是立论的基础，马先生的这些书稿无疑都是具有这样水准的研究论著。当然，学术贵切磋，在比较思辨中探索才能推陈出新。关于川东北考古中的巴文化研究，笔者是新手，所见与马先生有合与不合的，正想趁马先生大作付印之机，向马先生和有关方家们请益，故不揣冒昧附丽于此，以襄盛事，以冀斧正。

四川盆地的北部、大巴山与嘉陵江之间应该是探索巴文化的上选地段，但过去却基本上付诸阙如。1999年和2003年，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川东北的宣汉县罗家坝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战国墓葬 39 座，被媒体称为“20 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四川文物》，2003 年第 6 期），预示着川北大巴山与嘉陵江之间进行规模性的考古作业以及探索“巴文化”有了良好的开端。笔者有幸应四川省考古所之邀，曾先后两次赴罗家坝考古工地考察，并参加笔谈讨论。

在罗家坝遗址，地下保存着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和东周时期的墓地遗存。遗址堆积甚厚，约在 2~3 米间，年代跨度较大。遗址早期地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中有夹砂褐陶的花边口沿、折沿罐口、喇叭口罐沿、尖底器等，是川东北地区同期常见的出土物。发掘者认为，其与川北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峡江忠县哨棚咀一期、奉节老关庙下层、陕南李家村文化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是可信的。但笔者以为，由于未见到遗址出土的高规格器物，发掘所见的只能属于一般性的村落遗存。罗家坝遗址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这次只发掘了西南部临河的边缘面积 400 平方米，也许聚落遗存还在北面中部，目前尚难下结论。

罗家坝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晚期地层中清理出的战国时期的墓葬群。据查《文物》2004 年第 9 期发表简报的墓葬数与发掘者在工地所述和笔者所见的不同，墓葬数由 39 座减为 32 座，主要是因为《简报》把有些墓葬（约 6~7 座）合称为 K1 祭祀坑，却又未发表 K1 祭祀坑的资料。笔者仍保留原来的看法：所谓的 K1 并不是一个考古单位，不是祭祀坑，而是几个年代不同的墓葬遗存。但是，这些墓葬与早期聚落遗存之间的地层堆积存在着时间缺环，即缺失夏商至西周时期的地层。故罗家坝遗址是否是数千年连续的“巴文化”遗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原先在罗家坝西南已发掘的 38 座墓葬，其墓制和出土物的规





关于川东北考古发现的“巴文化”的讨论

格不高，说明这里是一处战国时期中下层平民或武士的墓地。但后来在罗家坝东北发现有一座被盗掘的墓葬，在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工作后编号为 M33。由于该墓已被盗掘破坏，只能知道墓圹南北长应在 9 米、东西宽应在 5 米以上，是一座准大型墓葬。葬具和墓主人遗骨尚不清楚。至于在西面发现的 3 具人骨架，虽与之平行放置，却不在一个平面上，是否属于同墓的殉人遗迹，由于地层关系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追赃后复原的墓葬观察，陶器尚未修复，而青铜器十分丰富，有兵器和礼器。青铜兵器为四川盆地战国巴蜀墓常见的组合——戈、矛、剑、钺、锬。难得的是出土时戈、矛尖与镦之间还有木杶相连，且成捆放置。礼器虽成组合，而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鼎、甗、缶、敦、簠、壺、盥缶、匝等与楚墓出土物相似，镶嵌水陆攻战图案的盖豆是中原风格，鍪、釜、尖底盒则是巴蜀文化之物。

该墓的年代似定在战国早中期为宜。出土这些高规格的青铜器在年代相近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成都羊子山 172 号蜀侯墓、新都马家蜀墓等侯王贵族墓葬中也曾有发现。因此罗家坝 M33 也应属于侯王级的贵族墓葬。那么，M33 的发现提升了罗家坝战国墓地的规格，这里应是一处有侯王贵族与平民共葬的族墓地。

论者都以为罗家坝遗址发现的是“巴文化”，但笔者认为应该是属于“巴文化”中的“賨文化”。“賨”原属蜀国，东周后巴人入川建巴国，今川东北属于巴国，賨既属于巴，故扬雄《蜀都赋》有“东有巴賨，绵亘百濮”之说。《三国志·魏志》称为“巴夷賨民”，即巴夷中賨民。所以笔者认为应称之为“巴賨文化”更为贴切。

首先，从地理环境讲，罗家坝遗址位于渠江的支流后河与中



河会合处的一级台地上，后河与中河会合后南流，到今宣汉县城附近又与前河会合后西流，是为渠江的东源——州河，流过今达州。宣汉的前、中、后河均发源于川东北与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南麓。渠江的西源南江是正源，发源于东接大巴山的米仓山南麓，在巴中县接纳恩阳河后称巴河，南流至渠县三汇镇接纳州河后始称渠江，再沿华蓥山西麓流至合川汇入嘉陵江。

渠江是嘉陵江的主要支流，《汉书·地理志》称“潜水”，《水经注·江水》称“宕渠水即潜水、渝水矣”。《水经注·潜水》云：“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盖古賨国也，今有賨城（林按：在今渠县城厢）。县有渝水，夹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汉祖入关，从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爱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县西北有不曹水（林按：即今州河），南迳其县，下注潜水。”渠江的支流众多，盘旋流淌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丘陵方山之间，形成密集的河网，是“山居水处”的土著的賨人与后来的巴人理想的生息之地，所以这一带的山水地名都与“巴”“賨”“渝”有关。

其次，从族称讲，“賨”确是古族，扬雄《蜀都赋》有：“东有巴賨，绵亘百濮”。《文选·蜀都赋》注引《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王时，阆中人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为阆中慈鳧乡侯，并复除目所发賨人卢（《巴志》为罗）樸（濮）、沓（沓）、鄂、度、夕、袭（龚）七姓不供租赋”。而其族名则是因汉代夷赋名目而后起的。据谯周《巴记》载：“夷人岁入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晋中兴书》说：“巴人称赋为賨。”

再次，賨的分布自嘉陵江流域的四川盆地的盆中丘陵地东至盆东并行陵谷区的长江干流。过去，重庆市博物馆曾收集到一件羊纽方寸金印，汉篆阴文为“汉归义賨邑侯”，邓少琴先生曾查得此印的出处为清光绪年间在云阳县南双河口夹沟坝出土，为农人锄地得大铜铳，内盛五铢钱万余并此金印（见邓氏《巴史新探》）。





关于川东北考古发现的“巴文化”的讨论

云阳李家坝遗址所在的彭溪河，据邓少琴先生考证，“彭”为《牧誓》八国之一，“彭人迁巴郡朐忍县（今云阳境），亦以彭称之。”《水经注·江水》有“江水又东，彭水注之……彭溪水又南，迳朐忍县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谓之彭溪口”之说。那么，李家坝墓群当与彭、賨有关了。这两支人都善战，所持的干盾称“彭旁”或“彭排”（见《释名》），连宕渠、渠江的“渠”也与干盾有关。《国语·吴语》云：“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渠，楯也”）。《释名》：“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木作之曰木盾”。这就是汉代善用木盾的“板楯蛮”名称的来历也。可是无论李家坝或罗家坝的武士墓中均未见出土盾饰，甚感遗憾。三星堆祭祀坑是出土过“蜀盾饰”的（见拙著《蜀盾新考》）。

要之，我们可以将罗家坝和李家坝的“巴人墓”进一步订正为“巴賨墓”或“賨人墓”。以此可见一斑，四川盆地内的“巴蜀墓葬”是可以再细分为蜀国或巴国之下各个民族的，今后还是有很大的探索空间的。例如巴蜀文化区内有许多在巴蜀文化笼罩下的不同族属的遗存。又如 2005 年 5 月在参观云南水富张滩考古发掘工地时见到的秦汉土坑墓葬群，既是“巴蜀文化”的，又有地方性文化因素（特别是陶器和装饰品），则很可能是巴蜀境内“僰人”的遗存。又如 2004 年 5 月《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组考察了陇南的成县及陇东的秦安、天水等地的博物馆的文物库房和陈列。那里的土坑墓出土的“巴蜀式”青铜容器（如鍪、提梁卣、釜甑等）和兵器（戈、矛、剑、钺）及漆木器等，也同巴蜀同期墓葬出土文物相似，表明东周秦汉间这里也确是“巴文化”的分布区。其中成县博物馆藏的巴蜀式青铜器、陶器、漆木器、鎏金铜器特别精美。其中有出土男女俑（类似三星堆纵目人）的汉代氐人墓，还有的墓出土鎏金铜牌饰（有天门题记、九尾狐、西王母等内



川东北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容)，与巴蜀地区重庆巫山县东汉墓葬出土的十余件鎏金铜牌饰极为相似，这是否与“巴氏”有关值得研究。故陇南、陇东地区的“巴文化”今后也应值得关注。

谨以为序。

2008年11月6日于成都





目 录

关于川东北考古发现的“巴文化”的讨论（代序）	林向	1
上 篇 川东北先秦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1
下 篇 秦汉时代的川东北		53
附录一 渠县城坝遗址西汉木椁墓三题		91
附录二 川东北崖墓考略		105
附录三 与巴賨文化有关的几个问题探索		112
附录四 走近古賨国——渠县城坝遗址一期考古发掘纪实		129
后 记		137

上 篇

川东北先秦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川东北嘉陵江、渠江流域是古代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本文在对川东北先秦考古三个重要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的考古调查以及发掘资料报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巴文化的起源、巴文化的多元发展、巴蜀青铜文化的形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希望能从该地区考古的角度，对整个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一、巴文化研究与巴人的传说时代概述

巴文化是学术界公认的我国西南地区长江流域在先秦时期一支活跃的考古学文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有了巴蜀文化的提出和研究①，但那个时候主要侧重的是关于古文献资料的研究，而且谈及巴蜀的书极少，多为连带述及。到 20 世纪 50 年代，随

着巴县冬笋坝、昭化（今广元）宝轮院等一批巴蜀战国墓葬的发掘和青铜器出土，对巴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但那时对巴文化的了解多局限在战国中晚期阶段。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以巴蜀史研究会成立为标志，随着考古发掘和巴文化研究不断取得许多重大成果，巴文化的研究进入了逐步深入发展的阶段。对巴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古代的巴人传说，包括原生的和再生的古代文献资料；二是来自于考古发掘发现成果。但是在中国浩如瀚海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关于巴人的记载可谓沧海一粟，由于正统的史书记载巴人往往只是寥寥数语，偶见叙述，零乱且相互矛盾。由于巴人的语言近乎失传，文字符号尚不能解读，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的谜团。今天的人们正是根据这些零星的资料，甚至是夹杂着神话色彩的巴人传说所透露出的信息，大致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轮廓：

1. 巴名的来源

关于巴名的来源，古人至少已有三种解释：

一是巴名源于河流形状的说法。《元和郡县志》卷 34 《渝州》条：（渝州为）《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这种记载最早见于已佚的汉代谯周所著的《巴记》，是一种起源较早、流传较广的传说。

二是巴名源出于动物形象的说法。东汉许慎《说文·巴郡》：巴，虫也或曰食象蛇。此说法源自《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三是巴名源于植物的说法。《史记·张仪列传》载：苴、蜀相攻击。唐司马贞作《索隐》解释云：苴音巴。……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也（苴在四川俗称芭茅，盛产于川东一带）。





今人也有不同的解说：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初论》引云：蜀人谓平川为坝，巴、坝音近，居于平地，因而名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引云：巴人呼石为巴，他们祖先居于石穴，因而名巴。李恕豪《试论巴的得名之由》：巴人崇尚白色，巴是白的意思。（以上各种说法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似乎都揣测居多，缺乏源因根据。比较而言，《说文》对“巴”字的解释令人信服一些。在远古时代，巴人居住的地方是虫蛇世界，从他们的远祖太皞伏羲氏起，为了生存，为了繁衍，一代又一代的斩杀虫蛇，为民除害，有过光辉业绩。“庖牺氏蛇身人面，而有大圣之德”等记载，反映出风姓巴人将“人首蛇身”作为图腾形象，表达对先祖的崇拜和祭祀。因而象形巴为大蛇之名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作者注）

2. 巴人的起源

最早谈到的是战国后期古地志《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此为巴人起源太皞说。（按照中国古代传说的划分，太皞氏族，风姓，居住在东方，属东夷集团，遗墟在陈，今河南淮阳县，他后人封国又全在山东境内，从太皞到后照，不知过了多少世代。这是把太古的事扯到战国整理成谱系齐全的西南民族历史，后来经过齐、鲁学者的综合整理，太皞与伏羲又成了一个人。这样，太皞伏羲就成了巴人的远祖。而在较古的传说中并不是这样，伏羲氏在南方，属于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太皞并非伏羲，虽然他的时代似乎相当早，与南方集团的渔猎阶段也未必不同时，或者更进一步拿代表渔猎时代的庖犧，包括这两个集团的最古时期，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能否成为巴人起源的依据，尚不敢妄下定论。——作者注）



另一种说法为巴人起源人皇说。晋人常氏作《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据我国传说，古代有三皇五帝三王，三皇时期可以说是完全神治的时期，晋人常璩是根据始创于西汉末而盛极于东汉初的谶书《春秋命历序》里说的“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云车，出谷口，分九州”和战国《禹贡》中关于巴蜀在梁州境内的说法，这也不能作为可靠的依据。——作者注）

还有一种传说，即“廪君种”的传说。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又名难留山，一般认为在今湖北长阳县境内），廪君（夷城巴人）通过掷剑比武与驾舟比赛而成为领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自《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虽然夹杂着浓厚的神话色彩文字，但这可能是巴人自己对最初发源地历史的如实记述。传说太皞氏族为了生存，把他的裔嗣分封降居到大江之北的巫山、丹山一带，后来又把他的嗣孙们降居到大江之南的武落钟离山一带，这就是巴人的一支廪君，此说线索清楚，可能为研究巴人起源的重要资料。——作者注）

3. 巴人的活动范围

巴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在鄂西长江两岸、陕南汉水流域、川东北大巴山南麓、嘉陵江渠江流域、渝东长江沿岸，数千年来巴人继承先辈精神和经验，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不懈斗争，为开发这些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巴人的生活

巴人长期生活在江峡两岸的高山和丘陵谷坝，以采集、渔猎和原始的农业生产为生，分散的居住方式决定了他们组织机构的松散、难以形成强大的整体。

5. 巴人的图腾

巴人以虎为图腾，勇猛善战，能歌善舞，俗好鬼神，实行祖先崇拜。（廪君的后人崇拜先辈射杀白虎、为民除害。虎成为廪君巴人氏族的图腾形象，如同他们崇拜祭祀祖先太皞伏羲氏斩杀虫蛇，与禽兽虫蛇之害进行斗争的光辉业绩而成为“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一样。——作者注）

6. 巴人的早期活动

在殷商时代，巴人被称为“西土之人”，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巴方”记载，其时活动在商王朝的西方，因不堪商王朝的伏击和“来享来王”，可能参加了武王伐纣战役，成为姬周“翦商”力量的虎贲军，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殷商军队，战后巴人受封子国，国都江州（今重庆市巴县）。

7. 巴人的战争

在春秋时期巴国见诸于史籍的记载几乎都是与楚、邓、申、庸的战争有关。春秋战国之际，巴楚多次交战，几经回合，巴终处于劣势，开始了几百年的迁移，向他们的祖先故地退却。“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治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最终在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结束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直到西汉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

8. 巴人的歌舞

《后汉书·南蛮传》《华阳国志·巴志》中均记载汉高祖争取天下的时候，他的军队中有巴人（賨民）作了前锋，他们喜





欢歌舞，常常带着歌唱来冲锋陷阵，每得胜利，高帝夸奖他们说“此武王伐纣之歌也！”再把他们的舞蹈保存在乐府，名为巴渝舞。

以上史籍记载的关于古代巴人传说，虽然缺少充分证据而且有许多地方难以让人信服，但它们仍然是研究巴人早期历史和巴文化的珍贵资料。

二、川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与巴文化的起源

概 况

川东北是古代巴人活动中心区域之一，位于大巴山南麓嘉陵江支流的渠江流域，以达州、巴中为中心地域，北枕大巴山，与汉水上游的汉中、安康接界；南依华蓥山，与广安相连；东抵摩天岭，和重庆万州、涪州接壤；西至嘉陵江，与广元、南充毗邻，嘉陵江的支流渠江由东北至西南流经全境，并与嘉陵江合流后注入长江。川东北北部高山大谷众多，南部条状山地和丘陵谷坝杂然相间，江河充沛，林木茂盛，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但是川东北的文物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过去一直滞后，没有受到重视，可以说是四川考古的空白区域。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有了许多发现，考古发掘工作才逐步开展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是先秦巴文化考古研究方面不断有了新的突破：

一是在时间上形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一春秋战国—西汉比较完整的考古文化序列；

二是在渠江流域发现了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宣汉罗家





坝、渠县城坝等一批极具鲜明特色的古文化遗址，对于探索巴族史和巴文化的起源、特征、分布及巴文化与賨人文化（或称巴賨文化）的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虽然川东北考古发掘工作起步不久，研究工作还只是处于一般的层面上，但是毕竟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本文试图通过川东北先秦考古的三个重要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的考古成果回顾，结合有关文献史料，对巴文化做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秦汉时代在川东北嘉陵江和渠江流域长期生活着一支被称为賨人的土著少数民族，賨人与巴人的起源、族姓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巴人进入川东北嘉陵江渠江流域以后渐渐被同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巴文化或巴賨文化。作为从属巴人的一支，巴人和賨人的文化在很远古的时候已经同化，融为整体，我们今天要将其各自分析已大非易事，而且他们离我们太久远，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賨人历史，也只是在后人追述巴人历史时所连带提到的，所以川东北先秦考古文化实际上是包括賨人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巴文化。

川东北新石器时代考古

川东北渠江流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当时达县地区13个县（市、区），包括现在的达州市、巴中市和广安市一部分，调查登记上册的重要文物点有3140余处。其中，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周的遗址和采集点有80多处^②，基本能确定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采集点有30多处，包括通江擂鼓寨^③、凤凰包、禹王宫、大梁上、沙泥坪、风箱崖、橡子坡、巴

